

叢文知求

世界大戰形勢

求知出版社出版

1941

求知文叢第十一輯目錄

本輯介紹（底封裏）

三論中國往那裏去

子強（一—三）

- 一、從貝當政府和希臘戰爭的認識說起
- 二、中國自有自己的道路
- 三、中蘇必須聯合
- 四、國共必須合作
- 五、人民生活必須改善
- 六、民主政治必須實行
- 七、可能有的困難和克服困難的條件
- 八、怎樣做？

關於民族文化問題

莊師宗（一—二六）

- 一、問題的提起
- 二、兩種流行的觀點
- 三、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民族要素

世界大戰的形勢

君萱（一—二〇）

- 一、更黯淡的一九四一年
- 二、歐洲大戰的戰略形勢
- 三、太平洋等霸戰的戰略形勢

民族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的魯迅（續完）

邵翰齊（一—四）

- 五、由進化論跨向階級論
- 六、魯迅對於階級論與社會主義的宣揚
- 七、由個性主義到集體主義的轉變
- 八、魯迅思想中的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統一
- 九、表現在魯迅文化思想中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一致
- 十、魯迅對於民族戰鬥傳統的繼承與發揚

超然先生列傳（長篇連載）

方生（一—一五）

第十回：創辦超然學校。

世界大戰的戰畧形勢

三十年一月五日出版

著者 君萱等

出版者 求知出版社

總經理 上海五洲書報社

山東路二二一號

特約 兄弟圖書公司

代定處 四馬路三七八號

亞美書社

青島路六七號

藝文書店

靜安寺路新市場

青年圖書文具商店

戈登路二十二號

經售處 各書店各報攤

本輯定價 七角五分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預約 每六輯一元九角
每十二輯三元六角

三論中國往那裏去

子強

327-01

6061

412

一、從對貝當政府和希臘戰爭的認識說起

許多人總是喜歡把『願望』當做『事實』，譬如上海輿論界對於法國貝當政府和希臘戰爭之性質的認識，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關於貝當政府，我們曾經指出，牠是爲了二百家金融寡頭的利益，而出賣了法蘭西的光榮，出賣了法國人民利益，投降了德帝國主義的附庸政府。這是因爲，法國政府自達拉第登台以後，根據着二百家的意旨，曾經一貫採取了反蘇反共的路線，結果是：一方面破壞了法蘇互助公約，使法國在戰略地位上陷於孤立的危局；另一方面完全喪失了國內民衆對戰爭的支持，就是說，即使想用什麼『正義』、『和平』、『反侵略』等等虛偽的號召來進行欺騙，也成爲不可能。——最後，終至使法國遭到了慘敗的命運。同時，由於法國人民力量的強大和反戰運動的高漲，在革命危機的嚴重威脅之下，法國資產階級終於不能不採取了急速對德投降的道路。在這種情形之下組織起來的貝當政府，自然也就不能不出賣法蘭西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叛賣法國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府，而且，自然也就不能不是聽命於德帝國主義的附庸政府。

但是，某些聯想能力特別強的中國觀察家們，却並不這樣「觀察」。他們起初是盛贊貝當爲了欺騙法國人民所作的「光榮和平」的謊言，繼則對貝當、魏剛、賴伐爾之流的「忍痛屈辱」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而最近，根據賴伐爾去職被逮的事件，甚至竟讚揚起貝當政府之能維護法國主權起來了！而這，恐怕就都是由於這些觀察家們，在目前抗戰困難增加和民衆勢力抬頭的情境之下，和貝當、魏剛之流有着某些相同的心情的緣故。

其實，貝當政府既然是建築在反共亦即反人民的基礎之上，今次賴伐爾的去職被逮，即使是因爲對德讓步條件的爭執，也不是由於保護主權而是由於一方面過大的讓步會激起法國民衆對維希政府之更大的仇視和反抗，和另一方面維希過大的讓步會促成英美的奪取法國的殖民地。但無論如何，大的投降，貝當既然已經做過了，最後還必然要順從希特勒的意旨的吧。

至於希臘對義戰爭的問題，我們一向是把她認爲只是英德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份，而不是什麼獨立的反侵略的革命戰爭。這當然不是說希臘人民對於義大利的侵略應該採取不抵抗政策，也不是說希臘在抵抗義大利的侵略時，不應該接受英國的援助，更不是說我們不同情希臘人民痛苦的遭遇，而是說止是在英國支配之下的希臘統治當局，把希臘導入了戰爭的漩渦，而且，現在正是爲英帝國主義的戰略利益而犧牲着人民的生命和財產。

因爲第一，如果希臘的親英的半法西斯統治當局在事前不採取親帝的投機取巧政策，而能尊重

人民的權利和意見，採取對外聯蘇對內民主的政策，希臘的中立就仍然可以繼續保持下去，因為那時如果德義軸心不願得罪蘇聯遭受兩面作戰的危境，義大利是不敢冒然進攻希臘的；而且，即使義大利萬一仍然不顧利害地侵略希臘，則蘇聯的積極援助固不成問題，英國爲了地中海的利益，也不能不支持希臘的抗戰，那時的情勢當比目前更爲有利，而抗戰勝利的成果，也就可保障不致爲英帝國主義所吞食。

第二，如果希臘的統治當局目前真正是爲了反抗義大利帝國主義的侵略而進行這次戰爭的，就是說，如果牠並不願根據英國的意志而行動，或者說，並不是完全爲了少數親英資產者要從戰爭中漁利的目的，那末，牠就應該積極改善國內的政治和經濟狀況，就應該廣泛動員全體民衆參加戰爭，以加強希臘自身在反義戰爭中的比重，同時也應該改善對蘇的關係，爭取蘇聯的支持，以免受制於英國帝國主義。但是事實上希臘的統治當局並沒有這樣做，因此，可以斷言，即使希臘幸而能隨着英國對德義戰爭的勝利而也『勝利』了，那時，除了少數人大發國難財和一般人民財產的巨大犧牲之外，對於希臘地位和情形的改善也將毫無幫助。上次參戰的教訓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更何況英德義戰爭中最後勝利究將誰屬，尚在未定之天呢。

可是，有些觀察家的意見卻是不同的，他們自始就把希臘對義大利戰爭同中國的抗戰混爲一談，認爲希臘也是像中國一樣在進行着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本來也難怪，他們甚至把英國對德義

的戰爭也譽爲反侵略的正義戰爭哩），特別是由於最近希臘軍隊在阿爾巴尼亞取得相當勝利之後，這種論調也就更加響亮起來。

實際上，希臘目前軍事上暫時能够勝利的原因是很多的，這一方面是因爲英國海空軍及軍火的積極的大量援助，另一方面則是因爲義大利本身存在的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弱點的暴露；或許，希臘民衆和軍隊對義大利法西斯的仇恨和由此而產生的對戰爭的某些支持，也是希臘目前能够獲勝的一個因素，但這並不能改變希臘「抗戰」之爲帝國主義戰爭一部份的基本性質，因爲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控制希臘和指導這一戰爭的，是英國帝國主義而決不是希臘自身。

二、中國自有自己的道路

可是，爲什麼那些人對於貝當政府和希臘戰爭會有這種觀察和意見的呢？而且，這種觀察和意見的主要錯誤是在什麼地方呢？

首先，我們應該指出這種觀察和意見之所由產生的客觀背景，乃是中國抗戰空前困難階段的到來，和國際局勢的巨大變化。我們說，自中國抗戰由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即相持階段之後，由於廣大地區的淪陷和沿海港口的喪失，由於政治上進步的不够和人民生活的日益困難，中國抗戰達到非常困難的地步。要想克服這一難關，就需要有錢者真正拿出錢來和有力者真正能够

出力（生活問題）而且樂意出力（民主問題），可是這却恰恰就是某些統治當局所不願意的，因此抗戰陣營中就不免引起了新的動搖和分化。再加以日本的誘降和英美的慕尼黑政策的策動，於是抗戰陣營中就明顯的形成了堅持抗戰到底、堅持民族團結、堅持民主進步、改善民生和堅持中途妥協、磨擦分裂、堅持專權倒退加重剝削兩條路線的對立和鬥爭。

可是歐戰的擴大、法國的失敗投降和英美法遠東勢力的削弱，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帝國主義兩大陣營更尖銳的對立，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的抗戰陣營，使得兩條路線中的後一條路線又發生了新的分化，即產生了依附英美堅持抗戰（最後還是犧牲抗戰）的英美路線和依附軸心對日投降的貝當路線的對立和鬥爭。

貝當路線的主張者，本質上方是投降論者。他們因為看到貝當政府表面上尚保持着牠的「獨立」的面貌，而這樣是一方面可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另一方面則容易欺騙反對投降然而認識不清的民衆，同時也可以藉助德義歐戰中初步勝利的餘威來達到他們對日妥協投降的目的。

即使拋開出賣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事實不談，主張貝當路線的投降派，甚至也沒有認清自己的利害和所處地位。法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雖然貝當政府終竟也還是一個投降的附庸政府，但牠背後還有世界最大財閥的「二百家」金融寡頭，相當大的軍事實力和廣大的殖民地，這就是貝當政府之所以有時還能同德國對面談談條件的根本原因。可是中國投降後的傀儡政府背後

能有些什麼呢？其次，誰都知道，由於其政治經濟發展的落後和貧弱，日本乃是帝國主義中最貪吝、最野蠻殘酷、最不顧信義的國家，即使由於投降有功暫時得保住一己的身家性命和財產，但根據東三省大資產者之終於在綁架敲詐勒索之下還是落得人財兩空，和張景惠、殷汝耕輩無恥之流的最後下場，將來還不仍然是『走狗烹』的結局。

英美路線的主張者，乃是企圖學取希臘的反動統治當局，把中國抗戰變為希臘式的『抗戰』。這是因為，他們一方面固然担心日本的侵略會毀滅了自己的地位和財產，可是另一方面，特別是在抗戰三年半以來人民勢力抬頭而他們自己又大都發了大批國難財之後，他們也担心着人民會反對他們的罪惡行為甚至從現有地位上把他們趕走。因此他們起初便企圖藉助於英美的慕尼黑政策，在英美的保護之下對日妥協投降，而現在則企圖直接投入英美帝國主義的懷抱，拿英美的錢打仗（將來自然要加倍『奉還』），讓人民餓着肚皮同侵略者拚命，自己則繼續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勢力大發其國難財了。

這同樣也是出賣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行為。因為英美路線的結果，即使在最『美滿』的情形之下，中國也不過僅能繼續保持其半殖民地的地位，那時英美帝國主義必然繼續束縛中華民族的自由發展，而廣大的人民，却必然處在戰後的更悲慘更困苦的地境。更何況，由於廣大人民的堅決反對、遠東大戰爆發後英美援助的不可靠、以及蘇聯友情的喪失，和英美與德義的勝負未

可預期等等，瞻望前途，也正未必會順着英美路線主張者的願望來被展呢！

因此，不是英美路線，更不是貝當路線，中國自有自己惟一可行的道路，那就是對外聯蘇、國共合作、民生改良和實行民主的道路。

三、中蘇必須聯合

爲什麼說對外必須聯蘇呢？

二十世紀是資本主義已達到其沒落階段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而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取得勝利以後的現在，更是兩個世界尖銳對立的時期，在這樣的客觀環境之下所產生的中國革命，一方面自然還是反帝的資產階級革命，可是另一方面，牠却又不能不成爲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就是說，這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却不能不帶有濃重的反資本主義的性質。因此，中國目前的革命就不是舊型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是新型的資產階級革命，即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了。

這樣說來，中國革命之所以成爲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首先就是以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新舊兩個世界的對立爲其主要背景的。這也就是說，中國革命乃是世界革命的構成份子之一，是屬於以蘇聯爲主導的新世界範圍以內的。既然如此，那末除非中國革命不想成功則已，要想成功就必然要同蘇聯聯合一致，不是很明白的事嗎？

而且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的解釋和三大政策中聯俄政策的決定，也就正是順着世界革命這一潮流而產生的。中山先生的遺教中曾經再三告訴我們警戒帝國主義的陰謀詭計，和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必要，而在其臨終時所寫的致蘇聯遺書中，尤殷殷以中蘇永久攜手並進相囑託。下面就是遺書的全文：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隸戰爭偏利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束縛。爲述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決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孫逸仙（簽字）』（旁點是我加的——子強）

在這封信裏，中山先生是多麼令人感動地流露了他希望中蘇兩國在推翻舊世界建立新的大同社會的鬥爭中長久攜手共進的真情，同時也深切地反映了他對帝國主義舊世界的不可調和的憎惡。這是值得每一個真正崇拜中山先生遺教（而不是僅僅口頭上或形式上崇拜）的信徒所再三體味的。

實際上，就是在蘇聯的一切方面的積極支持之下，中國才產生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運動的。在這以前，蘇聯早已首先宣佈了放棄一切沙皇時代在中國所享有的帝國主義權利，牠不但是第一個把中國真正當做獨立國家看待，並深摯地對中華民族的鬥爭寄予最大同情的國家，而且是真正站在中國背後強有力地支持了中國對於在華帝國主義的鬥爭。

可是中山先生的一部份不肖「信徒」們不久就辜負了中山先生的希望，違反了中山先生的遺訓，在帝國主義喉使之下竟藉口宣傳赤化，轉取了反蘇親帝的政策、驅逐了蘇聯的使節、封閉了蘇聯的使館，最後更斷絕了中蘇的邦交，甚至後來還在滿洲裏中蘇邊界演了一齣反蘇的醜劇。可是反蘇親帝的結果怎樣呢？結果是使中國更深陷於帝國主義的奴役地位，使中國在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略時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事實證明，反蘇政策原是違反中國民族利益而為帝國主義者所歡迎的死路一條。

日本的侵略和英美法等國祇圖自己帝國主義利益的態度，教訓了某些迷信和依賴帝國主義的

當局，在一九三七年中蘇又恢復了邦交，而抗戰爆發以後，中蘇更進一步的締結了互不侵犯協定。抗戰三年多以來，蘇聯不但在外交方面特別是在國際聯盟，積極響應了中國的一切要求和呼籲，而且在實際上給了中國以最多的援助，不管許多英美路線的主張者目前怎樣過份誇張英美最近對中國的援助，把美國和英國看做最可靠的「救主」，但僅就借款的數字來說，總計起來英美合計也還趕不上蘇聯對華借款四十萬萬元以上的總數。如果再加上蘇聯對華大公與私的精神、借款條件的無比優越、援華政策的始終不變，以及其他物質方面的幫助，更非英美專一根據自身帝國主義利害決定其對華政策者所可同日而語。

這就是說，不論根據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不論根據中山先生的遺教和政策，不論根據北伐革命時代的成就和中蘇絕交後的遭遇，或者根據三年半抗戰中國國外援助的經驗和教訓，都是以證明：中國抗戰建國的鬥爭除非不想成功則已，要想成功就必須堅持聯蘇的政策。

四、國共必須合作

為什麼說國共必須合作呢？

中國的資產階級是產生在資本主義已趨沒落的帝國主義時期，因此就使得牠帶來了先天不足的軟弱症，無力單獨領導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底於成；同時，由於帝國主義的直接的培養（在

中國投資建立近代企業），在中國却產生了數輩雖不多然而鬥爭性却非常之強的無產階級，牠不但在重重壓迫之下鍛鍊得堅強有力，而且能够接受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特別是俄國無產階級鬥爭的經驗和教訓，這就使得牠不能不成爲中國革命的天然的領導者；而且，中國一部份先進的無產階級，遠在一九二一年就組織了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並很快地取得全階級的擁護。因此，無產階級的積極參加領導，也就必然構成中國革命之所以不能不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因素之一。這樣，一向領導着中國革命的國民黨除非不要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則已，要想使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就不能不同共產黨採取聯合的戰線，實在是很顯然的事情。

根據着革命屢次失敗和俄國十月革命一舉成功的教訓，中山先生最先感覺到國共合作的必要。因爲中山先生當時深覺唯有國共合作才能達到根本改組國民黨使其成爲有組織有訓練的戰鬥的政黨，唯有國共合作才能充實國民黨的下層基礎、加強國民黨的力量，使其成爲真能領導中國革命的政黨。因此，中山先生才於一九二二年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提議，同意共產黨參加國民黨的組織，共同進行革命。

就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之下，國民黨和共產黨才不但很快地擴大和鞏固了自己的組織，而且真正領導起了全民族的革命運動，進行了光榮的北伐，創造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

可是，在帝國主義的挑撥和革命勢力高漲的恐怖之下，中國國民黨違背了中山先生的遺教、

放棄了中山先生賢明的聯共政策，轉而採取分裂、反共、剿共的政策。這就造成了以「四·一二」事變爲始的十年內戰的根源。

國共分家的結果，不但毀棄了北伐運動所得到的一切革命的成果，而且加強了帝國主義對中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控制，加重了地主資產階級對廣大民衆的剝削。十年剿共的結果，就正如毛澤東氏所說，並沒有剝出什麼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頂多也不過是剝出了一個可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一黨專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後，就已剝出了一個『滿洲國』，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剝進中國本部來了』。反共的成績就是如此。

幸而，西安事變之後，國共兩黨的人士都深切感覺到繼續內戰是死路一條，於是大家重新合作；而在抗戰爆發之後，共產黨取消了蘇維埃政府，改爲直屬中央的邊區政府，取消了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在三年半的抗戰過程中，國民黨的軍隊固曾建立了許多豐功偉績，然而八路軍和新四軍，在配備非常惡劣，物質條件非常困難的情形之下，却也不但給了敵人巨大的消耗，堅持了華北以及長江下游的敵後抗戰，並且經常牽制了日軍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配合了中央大軍的作戰。同時在經濟方面動員了一切可能的財力物力用到抗戰方面，普遍開展了生產運動，並多方打擊了敵人以戰養戰的企圖；在政治方面則不但動員了廣大民衆參加抗

戰，並真正實行了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總之，一切方面都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確盡了牠最大的努力。而這也就正是國共合作的成效。

這就是說，不論根據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根據中山先生的遺教和政策，根據北伐時代國共合作的偉大的成就和國共分裂後中國所遭到的悲慘的命運，或是根據三年半抗戰中國共合作所造成的抗日戰爭中輝煌的戰績，都足以證明：中國抗戰建國的鬥爭，除非不想成功則已，要想成功就必須堅持國共合作的政策。

五、人民生活必須改善

爲什麼說，人民的生活必須改善呢？

任何一個革命，其最後目的都不外乎大多數人民福利的增進，而生活問題則是一個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由於帝國主義的侵入，商品經濟破壞了中國的農村經濟，也加強了地租及高利貸的封建剝削，特別是帝國主義通過中國的買辦階級地主階級商人高利貸者大量榨取了中國廣大人民的血汗，使中國人民在帝國主義操縱剝削之下，日益陷入無以爲生的悲慘境地。尤其是佔中國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大眾，其終年生活的悲慘情形，更非言語所能形容。實際上就是這個迫切的生存問題，推動了廣大人民的積極參加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地主階級的鬥爭中。

史太林認爲民族問題實質上乃是農民問題，因爲「農民是民族運動的基本軍隊，沒有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強大的民族運動」，因此他便認爲誰要是不願接受這個公式，那便是「因爲他輕視了民族運動的內部力量，而不了解民族運動之深刻的民衆的，深刻的革命的性質」。可是，要想充分發揮民族運動的內部力量，推動廣大農民參加民族運動，那就不能不改善他們的悲慘生活。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實際上就是根據這一要求而創立的，其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和號召，就正是「民主主義之所以能在農民羣衆中取得巨大信仰的主要原因」。中山先生的農工政策，亦即以發動工農參加民族運動爲目的。中山先生所起草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說「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於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爲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爲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也就是對於農工大衆在民族運動中之重要性的正確認識。至於發動農工參加民族運動的辦法，則除方面以改善農工生活的主張相號召外，另一方面則採取具體步驟：「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

也就是由於這些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的號召和實行，廣大的工農羣衆才捲入一九二五——二

七年的革命而造成偉大的革命浪潮的。可是當工農羣衆更進一步要想把中山先生的主張見諸實行的時候，在羣衆革命勢力的威脅之下，當時的中國國民黨却違背了中山先生的遺教，背棄了他們對工農大衆所做的諾言，反轉而對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妥協，來鞏固壓榨工農的反動統治，並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三位一體地加強對工農大衆的鎮壓和剝削了。

但中國共產黨却堅持了中山先生改善人民生活扶植工農的政策，並在其所統治的地區對於人民生活的改善採取了許多具體的步驟。就是因此，在十年內戰中，中國共產黨才能在廣大工農羣衆中間建立起對自己的信仰而始終未爲中央絕對優勢的軍事經濟力量所消滅的。

抗戰爆發以後，爲了發動全體人民參加抗戰，改善民生的問題，也就又成了政府當局及一般人所注意的問題之一。三年多以來，這一問題在某些地區固也曾以減租減稅、合理負擔及獎勵生產等辦法，得到了適當的解決，然而却也還有許多地方人民的生活不但因了侵略者燒殺蹂躪而陷於異常困難，而且也因了某些達官貴人藉着自己的權勢和地位大發其國難財而更加困難，因而造成一方面要求工農大衆餓着肚皮爲國犧牲，另一方面自己都利用國難大發財源至一萬萬元以上之多的痛心現象。這樣自然只有減低一般人民參加抗戰的熱情，削弱抗戰的力量；這種情形當然爲敵人和投降派所歡迎，然而却是中國抗戰的絕大危機。

這就是說，不論根據民族革命運動的根本要求，不論根據中山先生的遺教與政策，不論根據